

史海钩沉

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书赴英国、美国展览经过

□ 雷强 国家图书馆展览部

一、导言

晚清以降，中国近代意义上的图书馆、博物馆纯属舶来之物，虽经维新之士提倡，但危局日艰，主政者无暇亦无力顾及此等文化事业；后经民国时期数代文化界、学术界人士奋发图强，逐渐蔚为大观。

国立北平图书馆（以下简称“平馆”）作为最早成立的国立图书馆，其主要职责固然在于搜采、编目、典藏、阅览、研究、出版等方面，但作为中国近代最为重要的文化机构之一，举办图籍类展览亦是其开发民智、启迪新知的重要手段，同时更是其开展中外文化活动的主要途径。在平馆历年主办、参与的各类型展览中有两次尤为特殊，皆选择馆藏古籍菁华远赴异国，前后经过因牵涉中外各方因素影响而异常复杂，今人多不知其详且常有讹传，值得详加考察。

二、参与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

（一）缘起

1935年11月28日至1936年3月7日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of Chinese Art, 以下简称“伦敦艺展”)在英国百灵敦堂(Burlington House)成功举办，该展是20世纪上半叶全球范围内以中国古代艺术为主题的最大规模国际性展览，展品数量之多、种类之繁、级别之高，至今仍难以再现，其中又涉及英、中等国政界、文化界人士的相互协作，意义和影响极为深远。中外学术界对该展颇为关注，自其开幕时起至今日仍常有专门研究问世，但这些论文和专著大多集中讨论前期筹备、国内舆论的支持与反对、上海预展和伦敦展览观众之反响，并以故宫博物院南迁文物中选取之菁华为对象焦点，对微观环节则关注不多，且常有错误^①。在所有中方送展展品中，平馆共拣选善本古籍50种，其数量位列

^① 如新近出版的专著《文物光华：1935年——1936年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研究》，不仅没有未能正确指明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筹备委员的组成，更误以为平馆仅选送了30种古籍，最为蹊跷的是著者误将民间对拣选展品的观点列为庄尚严之意见，参见陈文平、陈诞编著：《文物光华：1935年——1936年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研究》，上海书画出版社，2023年，第44—46、62、162页。

故宫博物院（735种）、中央研究院（113种）之后，为中方公藏机构第三位，这也是该馆首次将古籍善本送往国外参展，着实不应被学术界忽略。

以学术界已知的档案史料，平馆介入该展策划的时间相对较晚。1934年4月4日，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召开会议，讨论该院参加伦敦艺展的前提条件^①。平馆副馆长并兼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副馆长袁同礼此时正在美国考察，6月下旬转往欧洲，并在法、英等国盘桓甚久，无论是法国吉美博物馆（Musée Guimet）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档所保存信札，还是中国国家图书馆、故宫博物院档案中的公函、电文中均未见任何史料与之相关。但以袁同礼与伯希和、叶慈（Walter P. Yetts, 1878—1957）、大维德爵士（Sir Percival V. David, 1892—1964）等英方委员和外方顾问之密切往来，且时间、空间上之便利，他极有可能受故宫博物院委托就近在伦敦等地与外方人士接洽^②。同年10月9日，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令，任命行政院秘书长褚民谊、内政部次长甘乃光、外交部次长徐谟、财政部次长邹琳、教育部次长段锡朋、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侨务委员会委员长陈树人、交通部次长张道藩、铁道部次长曾仲鸣、平馆副馆长袁同礼十人为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筹备委员，王世杰为主任委员^③。10月24日下午四时，筹备委员会假教育部召开第一次会议^④。虽然，此时袁同礼赴马德里参加国际博物馆会议（International Museography Congress），未能出席筹备会，但平馆参与伦敦艺展已成定议。

12月3日，袁同礼放洋归来，抵达上海，12月6日即赴南京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筹备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王世杰、马衡、褚民谊、徐谟、段锡朋、张道藩、邹琳、陈树人均出席，杨振声列席，唐惜分记录。首由会议主席王世杰报告筹备工作进展，继由专门委员杨振声报告各次专门委员会会议各案，拟订铜器、瓷器、书画展品选取标准及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初选目录。随后讨论六项议案，其中有一项尤其值得今人注意，即“由本会专门委员会负初选之责，由英方来华选择委员负决选之责。”^⑤该项决议似未曾被中国学术界所明悉，导致常有学人引用此时民间较为极端的观点：

选择权必须操之于我。听说英国方面要求我方允其派代表到我中国来任意选择最精美的古物运往英国陈列。这我们认为最不妥当。世界上岂有自己的国宝而任人家来挑选的道理？国际亲善亲到任何密切的地步，恐怕也不会有这样大方的举动吧^⑥？

此种观点有民粹之嫌，误以为中国古物为伦敦艺展仅有之展品来源，全然不知现代国际展览筹备之跨国合作原则，且与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筹备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之决议彼此矛盾。实际上，筹备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对于“初选之责”“决选之责”的界定，不仅在中方

^① 徐婉玲：《在展览叙事与文化建构之间：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紫禁城》2021年第10期，第15—16页。

^② 如1934年10月25日蔡元培致信袁同礼，该函先寄送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再由其转交。参见王世儒编：《蔡元培日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94页。

^③ 《行政院院长汪兆铭呈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为经院议决派教育部长王世杰为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台北“国史馆”，典藏号001-032315-00001-001，第2—4页；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国民政府公报》1934年第1562号，第10页。

^④ 《伦敦中国艺展筹委会昨成立》，《申报》1934年10月25日，第3版。

^⑤ 《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筹备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纪录》（1934年12月6日），故宫博物院档案。

^⑥ 《筹备中的伦敦中国艺展》，《民间》（北平）1935年1月第1卷第17期，第25页。

确定送往英国的 1022 件展品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更影响了展品运抵伦敦后的拣选和最终实际展出的情况。

（二）选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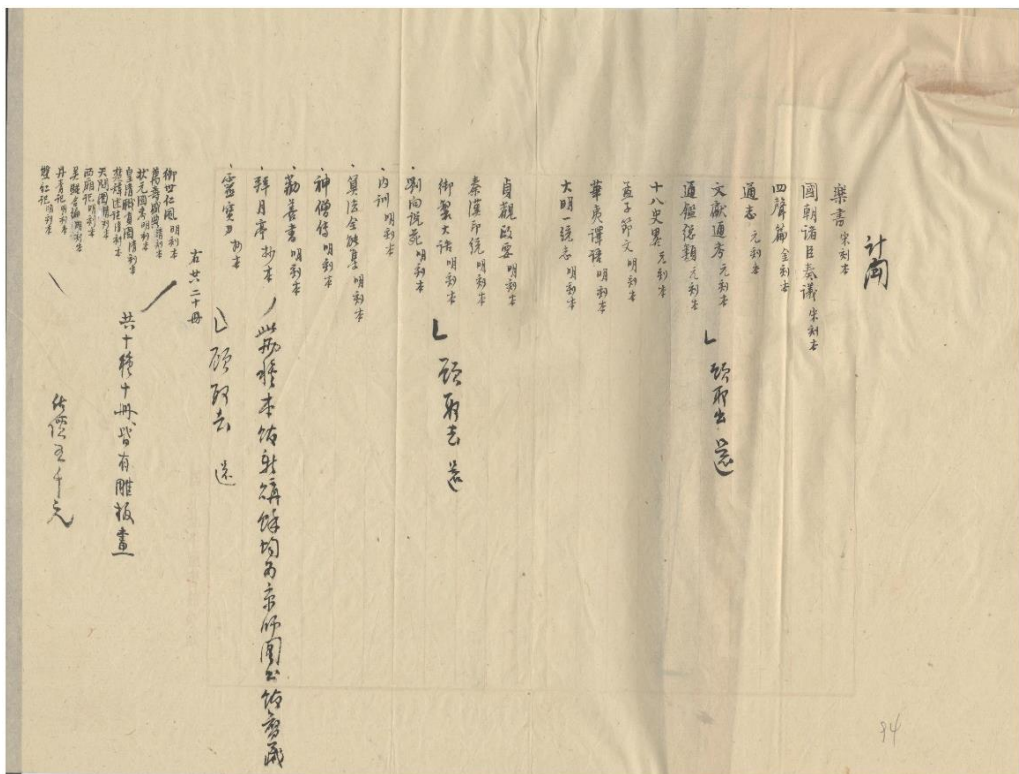


图 1 1935 年初平馆最初选取参加伦敦艺展之展品底单

1934 年 12 月 19 日，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筹备委员会致平馆公函，请于翌年 1 月 15 日前填具展品清单，并将参展展品备齐以便于 3 月送往上海预展陈列^①。收到该函后，平馆于 1935 年 3 月初选定古籍 30 种，并于 3 月 5 日将参展书目（表一）清单呈送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筹备委员会^②。此项展品清单中宋元明清刻本皆备，并有两部清代精抄本，后十种还带有版画。此外，平馆善本部主任徐森玉在选目清单底本上标注“估价五千元”，该细节颇值得今人给予注意。

表 1 平馆最初选定送往伦敦艺展的 30 种善本古籍

编号 书字	题名	版本	是否 展出 ③	英伦 艺展 编号	卷（册）
01	乐书	南宋刻本	是	3044	卷第八十三
02	国朝诸臣奏议	南宋刻本	是	3050	卷第一

^① 《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筹备委员会公函》（第四号），国家图书馆档案，档号 1934-※043-外事 2-007004 至 1934-※043-外事 2-007006。

^② 《函伦敦中国艺展会送展品察收给据》，国家图书馆档案，档号 1934-※043-外事 2-007007 至 1934-※043-外事 2-007010。

^③ “是否展出”及“伦敦艺展编号”皆依据英国皇家艺术学院（Royal Academy of Arts）编辑出版的展览图录 *Catalogue of the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of Chinese Art, 1935-6* 核查，表 2、表 3 中的相关信息亦从该英文图录中核对、摘录，特此说明。

03	改并五音类聚四声篇	金刻本	是	3046	第十二
04	通志	元刻本	是	3047	列传第七（通志第九十四，战国）
05	文献通考	元刻本	否		卷三十六
06	通鉴总类	元刻本	否		卷十一
07	历代十八史略	元刻本	否		卷七
08	孟子节文	明洪武官刻本	否		首册
09	华夷译语	明洪武官刻本	是	3069	首册
10	大明一统志	明天顺官刻本	是	3052	卷二十九
11	贞观政要	明成化官刻本	否		首册
12	秦汉印统	明万历刻本	是	3049	首册
13	御制大诰	明洪武官刻本	否		首册
14	刘向说苑	明初官刻本	否		首册
15	大明仁孝皇后内训	明永乐官刻本	是	3064	首册
16	算法全能集	明初刻本	是	3042	首册
17	神僧传	明永乐官刻本	否		卷六
18	劝善书	明永乐官刊小字本	否		卷十三
19	拜月亭传奇	精钞本	否		
20	灵宝刀传奇	精钞本	是	3070	首册
21	御世仁风	明万历刻本	是	3068	卷三
22	状元图考	明万历刻本	否		
23	西厢记	明刻本	是	3067	首册
24	吴骚合编	明崇祯刻本	否		卷一
25	丹青记	明万历刻本	否		
26	双红记	明万历刻本	是	3063	首册
27	万寿盛典	清康熙刻本	是	3061	卷四十一
28	皇清职贡图	清乾隆刻本	否		卷四
29	楚辞述注	清顺治刻本	否		首册
30	天问图	清初刻本	是	3062	首册

1933 年春夏，教育部（王世杰）曾密呈行政院，请藉故宫博物院古物南迁之际，以政府命令将该院文渊阁《四库全书》交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庋藏。教育部呈文（抄件）如下：

查《四库全书》北平藏有二部。其一部在北平图书馆，其一部藏在文渊阁。首都为文化政治中心，四方观瞻所集，公私藏弃，转无此书，实为缺然。现在首都中央图书馆业由本部派员筹备，中外一切图籍均在设法搜求。此项《四库全书》，自在最先征求之

列，理合呈请钧院鉴核转呈国民政府令行北京故宫博物院，即将原储文渊阁之《四库全书》一部，刻日运京，交由本部点收，转发中央图书馆储藏。国家文化前途实为幸甚^①。

恕笔者孤陋寡闻，此呈文未曾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台北“国史馆”等处所存档案中见及，仅以抄件形式附于袁同礼致叶恭绰之私人信函之中，其可信程度自可供学界商榷、讨论。笔者认为虽然叶恭绰时仅任闲职，但以其在文物、收藏界的领袖地位，且人脉、耳目极为广博，此件所谈之情形绝不可能凭空妄言，否则袁同礼不仅无法揭示中央图书馆（筹备处）所谓影印文渊阁四库的初衷，更会顿失前辈信任，自毁长城。时袁同礼兼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副馆长，肩负典守职责。1933年故宫博物院古物南迁自有其绝对的合理性，但倘若藉此时机开他所攫取文物之法门，则实在难平众人非议。而教育部作为政府机关的威信势必不能被公开诋毁，否则无异于“犯上作乱”，因此以平馆为代表的北方学人极力呼吁以善本代库本，极有可能是一种不得已之策略，其目的之一在于消解中央图书馆（筹备处）影印《四库全书》的合理性，藉此保全故宫博物院文渊阁《四库全书》的所有权和完整性。

考虑到平馆选取展品迟缓、宋元善本初选比例不高及1933年“四库风波”前后与教育部之间的微妙关系^②，笔者并不认为此处的价值标记是仅为投保计价，而是平馆在最初选择展品时已给予慎重考虑——若某方故伎重施，展品无法送还，损失的范围须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这一考虑无非有两方面的因素，一为价值多少，二为是否有副本或者可购藏同版本者补藏。于是在最初的展品清单中，虽有宋元刻本，但大体以明清版本为主。

3月8日，袁同礼由平汉线南下，先赴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后于15日左右转往南京，向教育部报告馆务。3月27日，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筹备委员会在上海四马路梅园酒家设宴款待外方委员伯希和、赫伯森（Robert L. Hobson, 1872—1941）、欧默福普洛斯（George A. Eumorfopoulos, 1863—1939）三人，中方与席者有杨振声、袁同礼、郭葆昌、张煜全、叶恭绰、吴湖帆、唐惜分等十余人^③。在京、沪两地盘桓期间，平馆参展书目正酝酿一次大增补，其最终结果即《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出品目录》中的“续到展品目录：珍本古书类（北平图书馆续送古书）”。

表2 平馆续送的20种古书

编号 书字	题名	版本	是否 展出	英伦艺 展编号	卷（册）
31	大方广佛华严经	六朝写本	否		
32	大般涅槃 ^④ （槃）经	六朝写本	否		
33	陀罗尼经	五代刻本	是	2989	
34	文选	北宋刊本	是	3043	卷第三
35	册府元龟	北宋刊本	是	3051	卷第六百一十二

^① 舒晨：《叶恭绰友朋尺牍》（三），《历史文献》（上海）2001年8月第5辑，第223页。

^② 1933年1月12日，因热河局势恶化，平馆委员会即考虑馆藏善本装箱并存放安全地点。5月2日教育部致电蔡元培、袁同礼请将平馆善本中最善者南迁，其中特别强调“明代《实录》及明人集仍系本来面目，远非《四库全书》删改者可比”，该语尤为刺眼，翌日平馆委员会即由胡适出面致信教育部次长段锡朋、钱昌照，以南方潮湿不利善本保存且已觅得安全地点为由婉拒教育部南迁善本电令。

^③ 《艺展预展：古物陈列竣事》，《申报》，1935年3月28日，第9版。

^④ 此处确为照录。

36	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	南宋刊本	是	3053	卷第十九
37	宣和博古图	元刻本	是	3048	卷二十五
38	艺文类聚	明正德活字印本	是	3054	卷九十一
39	颜鲁公集	明嘉靖活字印本	是	3045	首册
40	太平御览	明隆庆活字印本	否		卷第四百七十一
41	孟浩然诗集	明刻朱墨印本	否		首册
42	王摩诘诗集	明刻朱墨印本	否		卷五
43	十竹斋画谱	明崇祯刻五色套印本	是	3066	
44	劝善金科	清康熙刻五色套印本	否		第二本卷上
45	钦定词谱	清康熙朱墨套印本	否		卷七
46	古文渊鉴	清康熙刻五色套印本	否		首册
47	耕织图	清康熙刻本	否		
48	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	西夏刻本	否		
49	西夏文经律异相	元刻本	否		
50	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	元刻本	否		

《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出品目录》^①之续到展品类型包括书画类、家具类、文具类、珍本古书类，其中珍本古书增补二十种。此次增补，究竟因为何方意见，尚无学术文章予以讨论。在已公开的相关史料档案中，只有《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1909—1949）》记录一则相关信息：1935 年 4 月 4 日，平馆委员会召开第十八次会议，傅斯年、周诒春、胡适、任鸿隽、孙洪芬、蒋梦麟、陈垣、袁同礼出席，胡适作为会议主席，讨论议案之第三项即——本馆善本书籍送伦敦中国艺术展览案，议决照单通过^②。本次会议的内容仅以纪要形式留存，现已无从查悉更为具体的信息。除此之外，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档案中保存了两份相关电文。4 月 8 日，教育部部长、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筹备委员会主任王世杰致电袁同礼（图 2），请平馆增补参加伦敦艺展古书展品^③。

文津街国立北平图书馆袁守和先生：
参加伦敦艺展之古书，杰及筹委会同人均盼兄能将北宋版活字版及宋元版本增选送展，至盼电复京。

士杰，庚。印。

^① 必须指出，该份《目录》在 1935 年春夏前后刊印了三个版本，即最早无续到展品者、明确标识有续到部分者、未标识续到部分仅显示汇总后的总目录。
^② 北京图书馆业务研究委员会编：《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1909—1949）》，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 年，第 350 页。
^③ 《王世杰致电袁同礼》（1935 年 4 月 8 日），国家图书馆档案，档号 1934-※043-外事 2-007013。

12-1-100000

來報紙 RECEIVING 中國電報局 本局號數 256 JOURNAL NO.

THE CHINESE TELEGRAPH ADMINISTRATION

局 OFFICE

附註: -- REMARKS --

由 From 到 To 時間 Time 寄 By 寄 By

原未圖章 Shanghai

* SR120 SSS SHAI 2521 52/62 8 2010 -

PEIPING - 2429文 3160津 5894街 0948國 4539主 0554北

1627平 0956周 2579書 7419飯 5913表 1343守 0735和

0341先 3932生 0639考 0502加 0243倫 2415敦 5669藝 1455展

0037之 0657古 2579書 2638杰 0644及 4693爵 1201委 2585會

0681同 0086人 0971均 4162盼 0338兄 5174能 1412將 0554北

1345宋 3652版 3172話 1316字 3652版 0644友 1345宋 0337元

3652版 2609本 1073增 6693送 6623送 1455展 5267至 4162盼

7193電 1788復 0079京 0013士 2638杰 1649庚 SEAL 印

18

图2 1935年4月8日王世杰致电袁同礼请平馆增补伦敦艺展古籍类展品翌日，袁同礼覆电王世杰，告已增选善本^①。

南京教育部王部长鉴：

庚电敬悉，已选北宋元明及活字本古书、六朝写经、西夏文经，径寄沪。

同△复，青。

结合本年3月中、下旬袁同礼在南京、上海等地的经历，4月4日平馆委员会之会议和4月9日覆电之迅速，笔者认为王世杰和袁同礼的两电皆属官面文章，即公函流程。换言之，平馆补选送展古籍应在3、4月间即已切实商定。此次增补之举可能受两方面的推动，一是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筹备委员会之外方委员，二是国民政府教育部。

^① 《袁同礼致电王世杰》（1935年4月9日），国家图书馆档案，档号1934-※043-外事2-007012。

所幸此事尚可从外方档案中找到确切原因，法国吉美博物馆伯希和档案中存有 1935 年 4 月 6 日袁同礼致伯希和信（图 3），告知已经为伦敦艺展挑选了古籍善本，尤其选择了早期印本以满足其愿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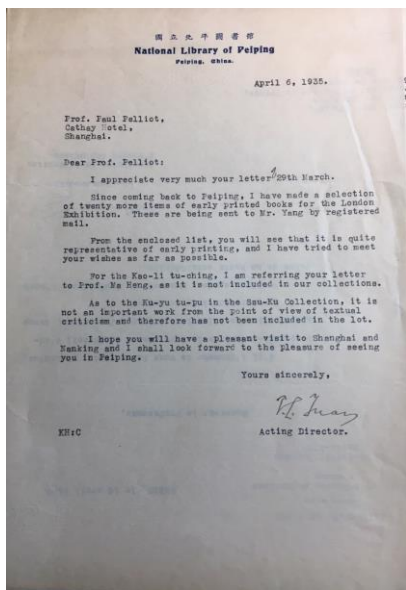


图 3 1935 年 4 月 6 日袁同礼致伯希和信

由该信不难得出以下结论：袁同礼由上海北返后，应伯希和的请求，从平馆馆藏中补选了 20 种善本古籍，用以代表中国早期印刷术的成就，并告这些展品将挂号寄送给杨振声。另外，《高丽图经》（*Kao-li tu-ching*）非平馆馆藏，已转询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之意见；而《古玉图谱》（*Ku-yu tu-pu*）并非要籍，故未选列。平馆增补珍本古书的这一过程，恰好印证了此前“由本会专门委员会负初选之责，由英方来华选择委员负决选之责”的方针。而伯希和有如此大的能力，笔者认为出于三个方面的因素：一为伯希和是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筹备委员会的外方委员之一，且为少数对中国写本、印刷品有精深研究的专家，尤为留意书籍类展品；二是自 1921 年秋袁同礼就结识伯希和^①，自此两人私、公往来密切；三是平馆王重民、向达等人赴法、英两国影照敦煌写经、太平天国出版物，无论是此项事业还是个人研究皆须受伯希和的照顾和指导，与之维持良好关系对平馆而言十分重要。

（三）展出

平馆参加伦敦艺展的 50 种古籍共装两箱，1935 年 6 月 6 日随铜器、瓷器、书画、玉器、剔红、景泰蓝、织绣、折扇等各类展品搬运至英国萨福克号巡洋舰（H. M. S. Suffolk）上，翌日离沪前往英伦。7 月 25 日，抵达朴茨茅斯（Portsmouth）。9 月 17 日，中英双方相关人员一同开箱。但所有展品运达英国后，因百灵敦堂“会场面积有限，不能尽陈，由选择委员，重加择抉”^②，国民政府送来之展品只陈列 786 项。平馆选送的古书属于杂项类，均置于“小南室”（Small South Room）内，其中 27 种并未实际展出。故宫博物院馆员傅振伦作为伦敦艺展的随行人员，对该室内展品有如下描述：

^① 袁同礼：《特载》，《清华周刊》1921 年 12 月第 228 期，第 22—24 页。

^② 庄尚严：《赴英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记》，《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年刊》1936 年，第 124 页。

此室物品，为吾国中央研究院在殷墟，城子崖之发掘品。法国所藏敦煌石室出土物品，写经，刻版，古书，拓本等品之外，佛教景教等宗教物品亦多。又有元代帝后像及天启砚，中国书法册页。此乃西方普通人士最不感兴趣处也。……

书刻之中……吾国北平图书馆来品五十种，就其陈列者言之^①……

而大部未展的原因，庄尚严仅以“考古选例及古书，英方以与艺术关系稍少，遂酌选一部分陈列之”^②一笔带过，因其亦为本次展览赴英之亲历者，故学术界偶有提及书籍类展品未展的缘由均遵循此说。

但笔者认为此仅为部分原因，甚至绝非决定因素。仅以 1937 年 2 月北平故宫博物院编印《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国外藏品照片展览目录》为例，伦敦艺展中“写经、刻本”实际展出且非平馆送展者即有如下之十余种：

表 3 《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国外藏品照片展览目录》之写经、刻本

编号	题名	伦敦艺展编号	出借方	备注
529	六朝写本金刚般若婆罗蜜多心经	2997	法国国家图书馆	
530	唐写本妙法莲华经	2995	法国国家图书馆	
531—532	唐写本妙法莲华经观世音普门品	2993	法国国家图书馆	
533	唐绣本佛说斋法清净经 ^③	2994	法国国家图书馆	
534	唐袈	672	法国卢浮宫博物馆	非小南室
535	唐刻本一切如来尊胜佛顶陀罗尼经	3014	法国国家图书馆	
536	唐刻本切韵	2996	法国国家图书馆	
537	唐刻本大悲菩萨像	3059	法国吉美博物馆	
538	唐套版彩印画	673	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	非小南室
539	五代刻本毗沙门天王像	2991	法国国家图书馆	
540	宋刻本佛像	637	印度新德里国家博物馆	
541	五代刻本阿弥陀佛像	3055	法国吉美博物馆	
542	五代刻本文殊师利菩萨像	2992	法国国家图书馆	
543	五代刻本陀罗尼咒	3040	法国吉美博物馆	
544—546	五代刻本金刚经（真言）	2990	法国国家图书馆	

^① 傅振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参观记》，《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年刊》1936 年，第 165—166 页。
^② 庄尚严：《赴英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记》，第 124 页。
^③ 《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国外藏品照片展览目录》将此件记作《唐绣本说斋法清净经》，或是排版时脱一“佛”字，笔者自行补正，特此说明。

而且《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国外藏品照片展览目录》收录尚不完整，如其序中所言：“我方筹备委员会，购得此项国外藏品之照片全份；曾在南京青岛两地，择要展览。嗣后筹备委员会委托本院整理编辑。刻下第一部整理工作，业已竣事，因拣选其中精要物品六百件，在北平公开展览。”^①该册目录确仅收录 600 种，与伦敦艺展实际展出之展品仍有些许出入。譬如，伦敦艺展实际展出之《耕织图》（伦敦艺展编号 3002），为英方人士 G. H. Wollaston 旧藏，由其女儿出借^②，平馆亦选送该件古籍至伦敦，却未能实际展出。

基于以上信息，不难得出以下推论——伦敦艺展虽以中国古物（艺术品）为核心，中国政府选送展品的数量、质量亦极为可观，但并非实际策展方，在布展环节更无决定权，艺展之执行委员会（Executive Committee）为了平衡参展的奥地利、比利时、英国（及其属地）、中国、丹麦、法国、德国、希腊、荷兰、日本、苏联、西班牙、瑞典、瑞士、美国十五国的利益，同类展品凡无公认之精品时，常以外方机构、人员的藏品优先展出。此一原则极有可能作为主因，并迭加小南室空间局促，导致平馆送展的五十种古籍多半未能展出。

虽然实际展出古籍数量仅为 23 种、且展出效果亦有限，但平馆参与伦敦艺展的意义仍属非凡，即为国立图书馆选送重要古籍赴境外之首次展览。不仅如此，平馆选送展品尤其是增补环节，体现出以袁同礼、伯希和为代表的中外学人彼此信任，竭尽所能向欧美政治、文化、学术界人士乃至普通观众展示中国古籍所承载的书写、刊刻艺术成就，在一个层面上践行了平馆“为文化交通之介的使命”^③。

三、一百种善本书运美展览

（一）缘起

1939 年 1 月，庚款停付，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以应收未收庚款作抵，按年向银行借款，以维持各项办理多年成效久著之事业^④。平馆作为该会最为重要的合办事业（与教育部），其购书费和经常费均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拨付，虽然抗战前就曾试图将购书费等列入政府预算，但一直未获批准。抗战之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拨付款项，一以维持最低限度之需要为原则^⑤。不仅如此，拨款大部以法币支付，平馆所获美金款项仅能维持最低限度的外文期刊续订。此外，抗战军兴后，外汇统制，机关和个人若以官价换取外汇皆须通过主管部门向财政部门提交正式申请，其手续和时间极为繁复。

此种情况下，袁同礼作为平馆代理馆长，已萌生了赴美申请援助的想法。1940 年 10 月初，袁同礼联系美国驻华大使詹森（Nelson T. Johnson, 1887—1954），拟将平馆存沪善本书运美，初步洽谈可能性和运输方式。10 月 16 日，詹森致电美国国务卿，请其联系相关部门以评估此事的可能性^⑥。1940 年 12 月 10 日，袁同礼拜访经济部长翁文灏，表示自己的症

^① 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编：《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国外藏品照片展览目录》，1937 年，序言页。

^② Royal Academy of Arts, *Catalogue of the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of Chinese Art, 1935-6*, London: Royal Academy of Arts, 1936, p. 257.

^③ 袁同礼：《国立北平图书馆之使命》，《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31 年 6 月第 6 卷第 6 期，第 3 页。

^④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编：《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三年来进行概况》，1944 年，第 1 页。

^⑤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编：《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三年来进行概况》，第 2 页。

^⑥ National Archives, RG 59 General 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Decimal File, Box 5865, 1940-44,

疾已近痊愈，欲以政府代表名义赴美募集捐款^①。22日，袁同礼再访翁文灏，仍谈赴美计划，并告拟偕徐森玉、李瑞年等人一同放洋^②。

(二) 筹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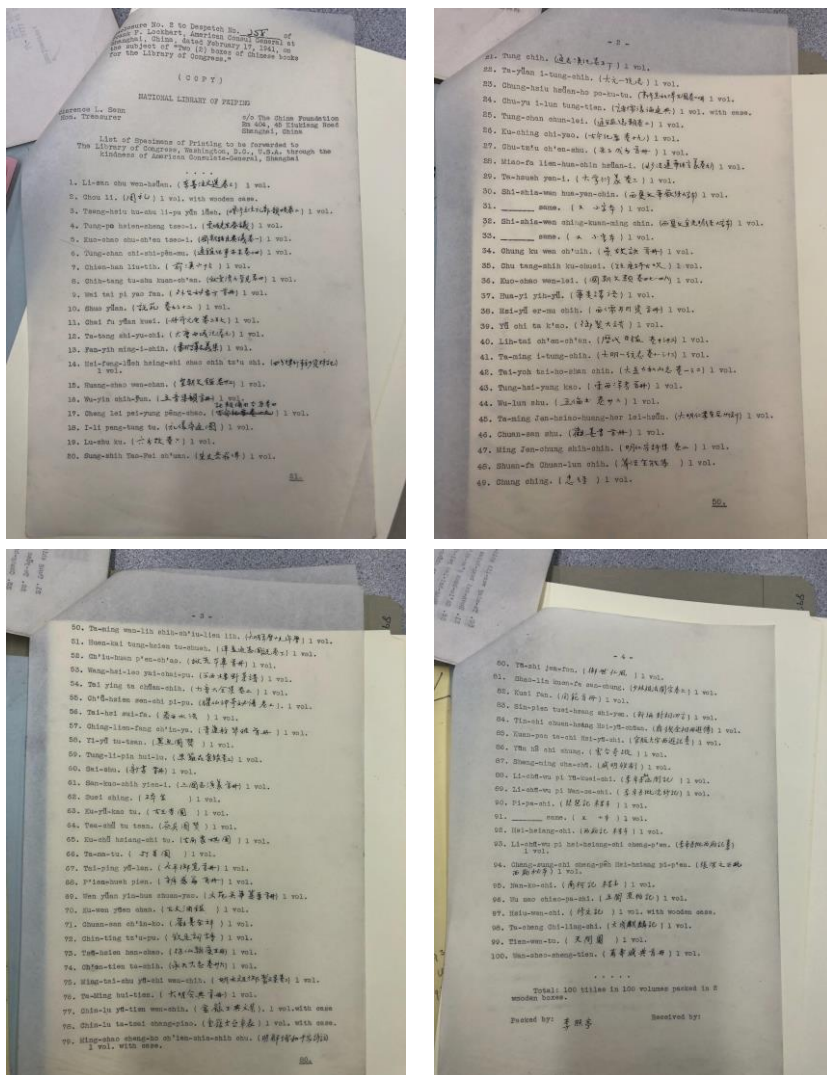


图4 1941年2月7日运美展览一百种古籍清单

以往学术界研究多关注于平馆一百箱善本书运美事，极少有学者注意到袁同礼曾选出一百种古籍善本赴美展览，仅有一篇学术文章认为“此次展览的整体规划，是在1941年3月至5月间确定的。”^③然而，这种观点与实际存在较大出入。1941年2月3日，袁同礼致信王重民，谈及其赴美及王重民归国后代行馆务等事。其中曾明确表示：“此外，曾选善本书样本100种，由美领馆代寄华京，以备展览之用。”这100种善本书（表4）离沪运美时间应为1941年2月7日，此时袁同礼身在香港^④，具体操作人员应为平馆驻沪办事处

Washington, D. C.

^① 翁文灏著，李学通、刘萍、翁心钧整理：《翁文灏日记》，中华书局，2014年，第594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研究室编：《胡适来往书信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758页。

^② 翁文灏著，李学通、刘萍、翁心钧整理：《翁文灏日记》，第598页。

^③ 林世田、刘波：《关于国立北平图书馆运美迁台善本古籍的几个问题》，《文献》，2013年第4期，第84页。

^④ 颜惠庆著，上海市档案馆译：《颜惠庆日记》，中国档案出版社，1996年，第315页。

员李耀南和钱存训，实际寄出方则为美国驻沪总领事罗赫德（Frank P. Lockhart，1881—1949）。以上信息虽未能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保存的史料档案中找到线索，但却可在美国国家档案馆（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nited States）所存国务院档案（General 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中找到明确记录。1941 年 2 月 17 日，罗赫德致信国务卿，告知受袁同礼委托，已于 2 月 7 日将平馆的两箱古籍送门罗总统号邮轮（S. S. President Monroe）运往美国，并强调该箱件送至美国国会图书馆（以下简称“国会图书馆”）所需的费用均已付讫，随件并附书单（抄件）四纸（图 4），各书均由中英文标注题名^①。此外，该份抄件仍有四项信息值得注意：一是首页左上部分标注有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董事、平馆委员会委员孙洪芬的英文名（Clarence L. Senn）和其在沪上的联系地址（即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办事处），似可证明该项展览计划并非仅出自袁同礼一人之设想，而应获得了部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董事、平馆委员会委员的赞成；二是古籍题名先由威妥玛拼音标注并打印，其后由平馆馆员亲笔填注其中文名称，似为钱存训手笔，但版本信息未能详细标注；三是该件末尾标注“100 titles in 100 volumes packed in 2 wooden boxes”，换言之明确 100 种古籍各 1 册；最后，装箱者为“李照亭”即李耀南。

表 4 平馆运美作展览用之古籍一百种

编号	题名	备注	编号	题名	备注
1	李善注文选	卷三	51	浑盖通宪图说	卷下
2	周礼	有木盒	52	救荒本草	首册
3	增修互注礼部韵略	卷二	53	王西楼野菜谱	
4	东坡先生奏议		54	太音大全集	卷上
5	国朝诸臣奏议	卷一	55	臞仙神奇秘谱	卷上
6	通鉴纪事本末	卷十四	56	泰西水法	
7	前汉六帖		57	青莲舫琴雅	首册
8	致堂读书管见	卷四	58	异鱼图赞	
9	外台秘要方	首册	59	东篱品汇录	卷上
10	说苑	卷九至十二	60	射书	首册
11	册府元龟	卷三百七	61	三国志演义	首册
12	大唐西域记	卷九	62	碎金	
13	翻译名义集		63	古玉考图	
14	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	有木盒	64	茶具图赞	
15	皇朝文鉴	卷三十二	65	古局象棋图	
16	五音集韵	首册	66	打马图	

^① National Archives, RG 59 General 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Decimal File, Box 5865, 1940-44, Washington, D. C.

17	证类备用本草	卷四	67	太平御览	首册
18	礼仪旁通图		68	辨惑篇	首册
19	六书故	卷六	69	文苑英华纂要	首册
20	宋史岳飞传		70	古文渊鉴	
21	通志	汉记卷五下	71	劝善金科	首册
22	大元一统志		72	钦定词谱	
23	重修宣和博古图	卷二十五	73	徐仙翰藻	末册
24	诸儒议论通典	有函套	74	承天大志	卷三十六
25	通鉴总类	卷二	75	明太祖御制文集	卷二
26	古今纪要	卷十九	76	大明会典	首册
27	朱子成书	首册	77	金篆玉典文集	有函套
28	妙法莲华经玄义	卷九	78	金篆大斋章表	有函套
29	大学衍义	卷三	79	明解增和千家诗注	有函套
30	西夏文华严经	大字本	80	御世仁风	
31	西夏文华严经	小字本	81	少林棍法阐宗	卷上
32	西夏文金光明经	大字本	82	闰范	首册
33	西夏文金光明经	小字本	83	新编对相四言	
34	崇古文诀	首册	84	鼎鍤全相西游传	
35	注唐诗古吹		85	官版大字西游记	卷二
36	国朝文类	卷四七至四八	86	云合奇踪	
37	华夷译语		87	盛明杂剧	
38	西儒耳目资	首册	88	李卓吾批幽闺记	
39	御制大诰		89	李卓吾批浣纱记	
40	历代臣鉴	卷二十至二十三	90	琵琶记	朱墨本
41	大明一统志	卷十一至十三	91	琵琶记	小本
42	太岳太和山志	卷一至二	92	西厢记	朱墨本
43	东西洋考	首册	93	李卓吾批西厢记真本	
44	五伦书	卷三十二	94	张深之正北西厢秘本	
45	大明仁孝皇后内训		95	南柯记	朱墨本
46	劝善书	首册	96	五闹蕉帕记	
47	明仁宗诗集	卷上	97	修文记	有木盒
48	算法全能集		98	大成麒麟记	

49	忠经		99	天问图	
50	大明万历十九年 历		100	万寿盛典	首册

笔者认为该份清单（抄件）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它作为美方信函的附件实际寄出，即为这两箱古籍的最初记录，不仅真实性毋庸置疑，且相对于《关于国立北平图书馆运美迁台善本古籍的几个问题》转录的《北平图书馆最初寄来展览书单》更为准确，后者仅抄录 1947 年由吴光清、B. A. Claytor、Mabel M. Lee 三人根据当时现状核对后得知的 41 种^①。经过仔细比对，此 100 册中《（李善注）文选》《重修宣和博古图》《御制大诰》《大明仁孝皇后内训》《国朝诸臣奏议》《华夷译语》应为 1935 年送往伦敦艺展之展品。另有《算法全能集》《御世仁风》《西厢记》等可能为伦敦艺展的同种同册。

1941 年 2 月 6 日，门罗总统号邮轮抵达上海，翌日离沪。该船并非在中美之间直航，而是途经菲律宾（马尼拉）^②，实际抵达美国东海岸的时间应为 4 月 5 日，其靠岸港口为纽约近旁之泽西市（Jersey City）^③。1941 年 5 月 14 日，袁同礼致信王重民，落款后之补语部分提及“运美展览书籍两件，如已收到，请国会囿来函证明，注明暂代收存。”实际情况恰如袁同礼信中预计，这两箱共 100 册善本书运抵国会图书馆的时间为 5 月 26 日^④。

考虑到本次赴美之议的核心目的是为平馆募集美金捐款，笔者认为其展览是重要手段和场所，即通过善本书展吸引学术界、文化界及各界人士关注，并以此为契机展开募捐活动，以期获得良好效果。基于以上推断，笔者认为这两箱古籍虽然寄送华盛顿，但展览举办地恐不限于国会图书馆，似应以此为基地，并在哥伦比亚、哈佛、耶鲁、普林斯顿、芝加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处^⑤举办规模不等的巡展，以便最大限度的达成目的。事实上，平馆善本书运美和袁同礼拟赴美申请援助、王重民拟回国效力互为表里，而一百种善本书送美展览恰恰是袁同礼赴美申请援助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实施

虽然，袁同礼获得了时任中央宣传部部长王世杰的支持^⑥、教育部的同意^⑦，拟藉善本书运美为契机前往美国募集捐款。但平馆委员会孙洪芬、傅斯年等人对先生个人赴美并由王重民回国主持馆务之议极力反对，导致此计划未能在 1941 年初成行。此外，随着 2 月 28 日王重民抵达香港，袁同礼遂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存沪善本书的拣选和运美事宜，后又因为美方政府的犹豫不决、国民政府迟迟未能电令江海关放行、江海关负责人的审慎回绝，致使 5 月中旬袁同礼几乎放弃善本运美计划。时王重民亦离沪回美，展览用书虽已寄出，但赴美募集之议的操作时间进一步被压缩；而王重民个人之语言能力、与美方学界之熟络程度均无法落实

^① 林世田、刘波：《关于国立北平图书馆运美迁台善本古籍的几个问题》，第 82—83 页。

^② “Personal Notes”, *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Feb. 12, 1941, p. 252.

^③ “Ile de France to be Used as Sea Raider”, *Los Angeles Times*, Apr. 6, 1941, p. 5.

^④ Library of Congress, *Information Bulletin* (1965), Vol. 24 No. 49, p. 649.

^⑤ 1941 年 1 月 23 日，袁同礼致信平馆委员会委员，其中不仅提及为馆中募集经费之议，更谋划与美国各大学展开图书交换，尤其提及到“东部为 Columbia, Harvard, Yale, Princeton，中部为 Chicago, Michigan，西部为 California, Hawaii 俾能普及而受效”（胡适著，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 31 册），黄山书社，1944 年，第 626 页）。此中相当院校为美国汉学研究的重镇。

^⑥ 王世杰著，林美莉编校：《王世杰日记》，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 年，第 315 页。

^⑦ 《会员消息》，《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41 年 2 月第 15 卷第 3—4 期，第 11 页。

展览计划。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袁同礼和家人失陷于香港，平馆善本赴美展览并藉此募集美方捐款之议已无操作性。

1941年9月至10月，平馆先后由上海运出100箱善本古籍，并分寄至华盛顿国会图书馆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其中前者为25箱，后者为75箱。1942年由驻美大使、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胡适主持，将所有箱件集中在国会图书馆，并授权其拍摄缩微胶卷。此时，在该馆工作的王重民肩负两项任务，一是编写该馆中文善本书目，二是监督平馆运美善本书拍摄胶卷。极有可能是为拍摄便利考虑，他将本作展览用的100册古籍与100箱古籍比对，前者中有59册实为从后者对应各书中拣选，遂归并同类^①。此种情况下，平馆寄送美国展览用书100种丧失整体性，展示的可能进一步降低。

然而，根据已公开的文献可知，在拍摄胶卷的间歇，国会图书馆就平馆运美善本举行了两次小型陈列，皆以宋本《大唐西域记》（卷九）为主体，分别为1945年12月1日至7日，地点位于主阅览室入口^②；1946年1月26日至2月1日，又放置于一层展室^③。但必须指出，这两次临时陈列仅为国会图书馆常年举办馆藏或暂存文献临时展览（Exhibit-of-the-Week）的一个组成环节，非专为平馆运美善本书而特别开设。此前，1944年春国会图书馆曾筹备Printing and Calligraphy in the Orient主题展览，在预告中明确提及部分展品来自于平馆运美善本书^④，十分可惜遍查国会图书馆内部发行的《信息公报》（*Information Bulletin*），未见此项展览开幕之记载。笔者认为，极有可能是为了保证缩微胶卷拍摄的连贯性，该次展览计划并未落实。

虽然1944年底袁同礼以平馆馆长身份赴美考察并联系美国图书馆协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各主要大学，肩负争取美援以利平馆、中国图书馆界战后复兴使命，但此时中美两国作为亲密盟友，在道义、责任两个层面上美国均已加大援华力度，筹措款项、募集书刊皆已不必再藉善本书展方式实施。此外，平馆运美善本书拍摄缩微胶卷自1942年起至1946年5月止，共计250万页^⑤。作为一项工程浩大的拍摄计划，操作阶段中不便频繁将其中的某些书取出，携至美国各图书馆、大学举办巡展。

然而，平馆最初选出的两箱赴美展览古籍，最终得以参与普林斯顿大学二百周年校庆活动，列入“远东文化与社会”（Far Eastern Culture and Society）论坛项下，作为一次特展于1947年4月初在该校的艺术博物馆（Princeton University Art Museum）举办。对此，平馆主办的《大公报·图书周刊》曾有报导，谓“北平图书馆中文善本，在珍珠港事变前运存国会图书馆，其中版画书为数甚多，平馆研究组主任王重民氏特选出一百种，乘该校召开东方学会议之际，展览七天。”^⑥此条消息为笔者在中文文献中找寻到的唯一记录，虽然弥足珍贵，但仍未许多细节有待进一步厘定。

^① 林世田、刘波：《关于国立北平图书馆运美迁台善本古籍的几个问题》，第82页。

^② Library of Congress, *Information Bulletin* (Dec. 1-7), 1945, p. 1.

^③ Library of Congress, *Information Bulletin* (Jan. 26 - Feb. 1), 1946, p. 1.

^④ Library of Congress, *Information Bulletin* (Feb. -Mar.), 1944, p. 12.

^⑤ Library of Congress, *Annual Report of the Librarian of Congress: for the fiscal year ended June 30, 1946*,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7, p. 258.

^⑥ 《学术界消息》，《大公报·图书周刊》，1947年4月19日，第6版。

首先,暂存于国会图书馆之平馆善本书如何能参与普林斯顿大学之校庆活动?笔者认为主要是出于三方面因素,一是该校对于“远东文化及社会”论坛主旨内容的界定十分明确,即以艺术史和社会学为讨论核心,尤其强调中国对整个地区文化特质的影响作用^①。为了配合艺术史方面的讨论,该校共筹备了五个展览,主题分别为铜器、校友明慕理(DuBois S. Morris, 1873—1956)收藏中国绘画、石刻雕塑(拓片)、平馆善本书、梁思成拍摄的中国古代建筑照片^②。而平馆运美的100册古籍的确如《大公报·图书周刊》之报导“版画书为数甚多”,不仅能够反映雕版、印刷技艺,也可从侧面展现明清两代艺术和审美情趣,与“艺术史”这一论坛主旨极为契合。二是袁同礼代表平馆与该校达成的合作意向。1946年5月15日,再次赴美访问的袁同礼前往普林斯顿大学拜访美国艺术史学者George Rowley(1892—1962),并前往葛思德东方藏书库与孙念礼(Nancy Lee Swann, 1881—1966)晤谈^③,虽然该次会晤之细节并未有更详尽的记录,但George Rowley恰是“远东文化及社会”论坛负责人^④,此时两人极有可能讨论了在校庆活动中举办相关展览的可能性。三是,1945年7月至1947年1月王重民数次前往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藏书库调查、编目,与孙念礼等人非常熟络,能够贯彻袁同礼与该校商洽合作办展的计划。

其次,实际展出古籍善本是否即1941年2月由上海运美的100种100册?1946年10月21日,袁同礼致信王重民,在落款后之补语部分,尤其提到“关于善本书装箱事,想已筹划,不识应新购之箱已定做否?将来除送Princeton展览之百种外,余箱均请于大驾离美前办妥。”11月4日,袁同礼致信王重民,就普林斯顿大学展览事再作交待,“至Princeton展览之百种均交子明保管,届时由渠送往陈列可也。”虽然这两处表述与《大公报》的信息一致,但笔者认为实际展出数量应不及100册。笔者数年间多次联系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申请二百周年校庆档案(Bicentennial Celebration Records),却被告知并未保存相关书信和展览清单;而论坛手册*Far Eastern Culture and Society*只刊印了《西厢记》版画书影一幅,未能提供更多信息。所幸国会图书馆作为此次善本书展的协办方之一,保存了相关记录,该馆内部发行的《信息公报》记录:国会图书馆出借了54件馆藏善本、平馆送展了24册古籍^⑤。笔者认为该条信息较《大公报》、袁同礼信函中的表述更为准确。首先,刊登这一消息的《信息公报》卷期为1947年9月底发行,换言之它确为平馆善本书展在普林斯顿大学举办后的记录,对实际情况描述可能更为准确。其次,1947年3月6日王重民偕夫人刘修业、幼子王黎敦抵达上海,1946年5月缩微胶卷拍摄工作结束至归国之间,王重民已将平馆在美之所有善本古籍重新装箱,此时方便取出并送往普林斯顿大学者应在41册以内。

最后,展览是从何时开始至何时结束?具体布展事宜是哪些人担任?《大公报·图书周刊》的报导和论坛手册,均未指明展览的期间,但据论坛手册可知,3月31日普林斯顿大

^① Princeton University, *Princeton University Bicentennial Conference on Far Eastern Culture and Society: far eastern culture and society*, N. J.: Princeton, 1946, p. 1.

^② Princeton University, *Princeton University Bicentennial Conference on Far Eastern Culture and Society: far eastern culture and society*, pp. 2-3.

^③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Peiping, National Library of, 1937-1944, AC123, Mudd Manuscript Library: Box 415, N. J.: Princeton.

^④ Princeton University, *Princeton University Bicentennial Conference on Far Eastern Culture and Society: far eastern culture and society*, p. 4.

^⑤ Library of Congress, *Information Bulletin* (Sep. 23-29), 1947, p. 7.

学举办中国艺术为主题的五个展览的预览，而与之相关的学术会议自4月1日起至4月3日止^①，因此笔者较为认同《大公报·图书周刊》的表述——“展览七天”，即3月31日和4月的第1周。平馆善本书展览目录应由吴光清、王际真、尤桐、王重民完成^②，但实际布展人员应为前三人。

四、结语

无论是伦敦艺展中古书的选取还是送美善本书的拣选，平馆皆以是否存有版画为重要去取标准之一。坦言，此实为无奈之举。首先，中文书籍大多以汉字为符号单元，以内容见长的典籍其艺术表现力远远弱于大多数文物类展品，对西方观众而言全无着眼之处。其次，除非展示空间充足，且展品为经折装、写经卷轴能全部铺开，绝大部分古籍仅能展示某一页，置于展柜之中又无法便捷更换页面，而铜器、绘画、玉器、漆器、织绣、文玩杂件等物均可让观众一目了然。最后，西方观众多不识汉字，更对古籍所承载的中国雕刻、制版、印刷技艺全无认识；大多数西方汉学家对中国传统版本、目录学亦无根基，难以明了展品的罕见程度。此种困境，亦可从伦敦艺展和普林斯顿大学二百周年校庆“远东文化及社会”论坛所举办的相关讲座得以窥见，前者举办了24场讲座^③，各类古物、艺术品大都有多场专题类讲座，唯无以古书为主题者；后者与平馆选送之善本书直接相关的讲座则为园林设计和图像学（Garden Design and Iconography）^④。

相对于其他类型的中国古物、艺术品，书籍类展览极少在西方举办，而展品多为中国国立图书馆选送则更无先例。虽然在英国、美国两次展览中，实际展出的平馆善本书数量均有限，但亦可算近现代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以书籍为媒介的重要时刻，有开先河之地位。其中前后筹备经过，特别是中外人士共同努力，以期更好地向西方学者、观众介绍中国典籍文化，实在值得今人铭记。最后，廓清平馆一百种善本书运美展出的前后历程，可以彻底解决该馆善本运美并最终运台这一曲折过程中的部分疑问，而这恰是包遵彭在《“国立中央图书馆”典藏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序言中提到“唯该原清册仅一百箱之目，而实际运出者为二箱，故清册与实际箱内所贮略有歧异”的关键所在^⑤。

^① Princeton University, *Princeton University Bicentennial Conference on Far Eastern Culture and Society: far eastern culture and society*, pp. 30-32.

^② Princeton University, *Princeton University Bicentennial Conference on Far Eastern Culture and Society: far eastern culture and society*, p. 35.

^③ 郑天锡编：《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报告》，1936年，第37—39页。

^④ Princeton University, *Princeton University Bicentennial Conference on Far Eastern Culture and Society: far eastern culture and society*, p. 31.

^⑤ “国立中央图书馆”编印：《“国立中央图书馆”典藏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1969年，序言第2页。